

# 民国时期的四川省 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

(1938—1949年)

## 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属域，在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由川军28军在茂县设屯殖督办署，辖松、理、茂、懋（今小金县）汶、靖（今金川县）6县，其余“三番”（今黑水县大部的新番、旧番、三齐番）“四土”（马尔康、党坝、松岗、梭磨）等地仍沿旧制为土司、头人所管。后，蒋介石政权的势力乘剿共之机侵入四川，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于民国24（1935）年将四川划设为16个行政督察专区，实现了“川政统一”。今阿坝州属域划设为第16行政督察专区，并于民国25（1936）年2月，在茂县设立专员公署。由于地处边陲，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工商不兴，人民穷困，除当时的松、理、茂、懋、汶、靖6县政令可达外，其余地域均鞭长莫及，故素称“难治”。

国民政府统治四川后，便力图以开发边疆教育，启发民智，从而着手治理。民国26（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后，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节节败退，国民党军、政等机关纷纷内迁，四川便成了抗日后方根据地，开发边疆更尤显重要。于是，四川省教育厅旋即派冯克书任“十六区”教育视察员，亲赴茂、松、理、汶等县实地考察。回省后，向省政府呈写有《理番县考察意见》和《松潘考察述要》。他在《考察报告》中说：“该区交通险阻，生产萎缩，文化落后，生活困难。然，民众吃苦耐劳，勇于进取，如能在此创办师范学校，培育人才，发展经济，则大有可为。”并建议“如学校建成后，应广收少数民族上层子弟入学；

组织电影巡回教育队，深入草地、村寨以启迪民智。”

早在民国20（1931）年，原屯殖督办署在茂县设立一年制师范班，但终因条件不具备，师源、生源都缺乏，故开班后不久便停办。

民国27（1938）年，四川省政府根据冯所呈《考察报告》，原拟筹设“省立茂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并派冯克书为筹备主任，同时令茂县十六行政督察专区，利用公共房屋改建校舍。经复“实无公共房屋以资利用”后，经冯克书实地考察、选择，呈请“以理番县威州镇旧文庙、理番县威州小学（仁寿寺）、龙王庙及附近民地为校址”。

民国28（1939）年1月，四川省政府准如所请，随即指令理番县政府遵办划拨。理番县长徐剑秋着派教育视导秦朝富、督学曹健初赴威州指挥划拨及协助收买民地等事宜。在理番县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大力帮助下，历时一年多，学校可敷教学主体工程基本告竣。民国29（1940）年秋季开始招生。从此，在“天生一岭界华夷”的边远山区，便有了一所为“开发边疆”培养人才的学府（注：“天生一岭界华夷”句，引自清·董湘琴《松游小唱》”）。

按原四川省政府的意图，本拟将学校设于专区所在地茂县，为培养急需的乡村初级小学教师，故原定名为“茂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后因校址择定在威州，且其招生规模已分设有师范部（中师）、简师部（初师），经呈请四川省教育厅批核，于学校建成招生时，便定名为“四川省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一直至1950年，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时，仍沿用此名。

## 二、学校建筑及教学设施

民国28（1939）年1月，四川省教育厅对所派筹备主任冯克书呈请将学校修建在威州的报告批复同意后，迅即指派教育厅技

士吴立卓主办学校修建设计；派施工员马友德雇工承建，于是年3月便破土兴工。

威师修建时，威州市区户不过300，人口近，街长自东城门（今州武警支队二大队处），至西城门（今威州大桥处）仅约800余米，民居房舍都系木石结构平房和穿逗木架瓦房。在交通不便、物资全靠人背、马运的情况下，因其地处“十六区”交通孔道，仍显得有些繁荣景象，是当时理番县首善之区。

其时威师的校舍建筑，在由教育厅专派的技士和施工人员的精心测绘，因地制宜，依就地形，省工节料的总体布局下，限于当时的条件，整个建筑全为木石结构、篾笆装隔、外糊石灰的一层瓦房。经过近两年时间，遂建成教室两幢计八间，约570m<sup>2</sup>；收发室及会客室对称各一间，约30m<sup>2</sup>；办公室一幢计五间，约112m<sup>2</sup>；凉亭式古典建筑礼堂一幢，约160m<sup>2</sup>；学生厨房一幢，约70m<sup>2</sup>；回生厨房一间，约10m<sup>2</sup>；教职员厨房一幢，约70m<sup>2</sup>；教师宿舍一幢，十间约200m<sup>2</sup>；学生宿舍一幢，一楼一底约180m<sup>2</sup>；姜维城山麓男生宿舍一幢，约120m<sup>2</sup>；男女生厕所各一幢，约100m<sup>2</sup>。学校占地面积约14亩，建筑使用面积约1672m<sup>2</sup>，体育用地约620m<sup>2</sup>。

由于布局设计得当，从临街的古牌坊式上横书有“四川省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两侧八字粉墙上书写有“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的第一道校门瞭望，便可见雄狮高踞的第二校门，甬道上书“为民先锋”的横壁匾，沿石阶而上，耸立中央幅射全校的古建筑凉亭式的礼堂，与威州当时的市容相比较，真堪称为辉煌的“学宫”。无怪当时“十六区”专员，及各县赴任县长路经威州时，常憩息于威师，并誉称威师是“十六区最高学府”。

然而，抗战甫平，内战又起。国民党政府忙于“戡乱”之不暇，遑有心思办学。更兼法币贬值惊人，自建成后校舍从未修

葺，学校设备简陋。直至解放前，全校仅有学生课桌椅200多套，上下铺木床100多架，黑板8张，办公桌十多张，生、理、化教学实验仪器，自开办时由教育厅配发了一套中等学校生、理、化教学实验仪器后，从未添置。图书中，大部成套精装书籍极少，总藏书量仅3000多部（册），至民国34年（1945），时任校长唐开虞曾添置国民教育丛书一套，体育器材除篮、排球外，仅有铜球、铁饼、标枪等。

### 三、课程设置

民国时期，威师课程设置，原则上是根据《修正师范学校规程》的规定开设。即，中师在三学年中，必须分别先后开设公民、国文（此两科三学年均开）、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中外历史、地理、教育行政、教育心理、教学概论、教材教法、音乐、体育、美术、农工艺及实习、军训。根据学生毕业后服务山区的需要，增开有“番语”（藏文）；为适应乡村小学协助地方行使《宪法》，开设有地方自治课。女生另开设有家事课（教习缝纫、烹调等家庭工作）。后“番语”、家事两科因缺教师而停授。

简师在整个学习阶段中，分别先后开设公民、国文、代数、算术、化学、物理、中外历史、地理、教育行政、教育概论、教材教法、音乐、体育、美术、农工艺及实习、博物、生理卫生、农村经济及合作、童子军训练、注音番语、家事（女生）、教育测验及统计、教学实习。

教学实习课于第三学年开始。由于当时“十六区”急需小学教师，故从开办起，毕业生于第三学年下期就提前出校，分配到各县，正式担任教学工作，以代实习，于期末返校参加毕业考试。

#### 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

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原名文潜，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曾留学美国，随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促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生活。“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曾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1946年在“白色恐怖”下病逝于上海。

这样一位属于人民的、革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能为当时设立在边区的威师所采用、推行，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已更名为“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至今仍在操场的墙壁上书写着当年威师曾写的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手脑心并用，教学做合一”，便有力地说明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半个多世纪来，对这所学校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不难得出结论：这位爱民主、爱人民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能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办的师范学校所推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威师建立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抗日救国，开发边疆教育是大势所趋，并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关注。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救国论”正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创办威师的目的相吻合，因而能为其接受。但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能得以在威师推行和发展，在建校之初

便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因为首任校长冯克书，是一位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开发边区教育的忠诚实践者。他所聘任的教师，大多是具有爱国热忱，学有专长，并能与他协调一致，勤奋工作的。自学校招生后，无论在教学上，或在平时生活上，都贯穿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他曾多次告诫学生说：作为一名师范生，应该明白怎样才能做到“教学做合一”，必须了解教、学、做是一件事。首先，做是中心，从做上学，在做上教。因此要求学生要认真完成作业，所设劳作课、农工艺、女生所开设的“家事”，都体现了“教、学、做合一”的精神，使学生“从劳力上劳心”而达“手、脑、心并用”的目的。在贯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方面，为了使學生知道耕稼艰难、物力维艰，学生厨房门上横书“思来处”三字；为了使學生不忘国耻，在学生寝室门顶上书横匾“卧薪尝胆”。并常组织学生去青坡背煤、背石灰，使學生与群众接近，了解社会，以体现陶行知主张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教育思想。

由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仅符合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教育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为我国尚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经济发展差别的地区发展教育所采用。

建国迄今，威师毕业学生遍布全阿坝州，为发展边区教育文化和其它事业，能作出一定的贡献，这正与学校一贯遵循着陶行知关于“教育与实际相结合，教育为人民服务”和“手脑心并用、教学做合一”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培养学生的准则不可分的。

因此，在教育方面，学校务使學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服务边区为坚定不移的志向；在教学中，通过培养动手能力，将“手脑心并用”、“教学做合一”有机地融入于教学中，使陶行知教育思想更得以在威师持续推行和发展。

## 五、校长任命及教师聘任

据有关资料记载，威师建校初期，校长的任命和教师的聘任，是根据民国25（1936）年7月所颁布的《任命中等学校校长规程》关于：“校长由教育厅提名，报请省政府任命”的规定进行的。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原则上由校长聘任，呈报省政府和教育厅备案。但，教师的聘任和薪俸，须依照《修正师范学校规程》所定教员资格，于每年4月30日及11月30日以前，缮具拟聘教员和教员个人登记表，一式三份，连同照片及证件（经检定合格者免缴）呈报教育厅备案。经审查合格的教员，由教育厅送“四川省中等学校教员聘任及待遇审查委员会”核定薪俸等级后，才令准原校聘任。教员在取得应聘资格后，还须向“四川省中等师范学校教员检定委员会”呈交《志愿书》和《履历表》一份，请受检定和考试。

学校训育主任（主管学生思想教育的）童子军训练教官和“公民”课（犹今之政治课）教员的聘任，除履行上述手续外，还须根据其条件要求（如必须是国民党员）单独填表，交“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才能由校长聘任。而《公民》课一般都由校长担任。

当时“师范部”（中师）受军事训练，全校实行军事管理。军训教官及助教，由四川省军管区编练处派任，一般均派具有营、连级以上军衔者（雷金波任校长时期，所派的军训教官周存宪，还是正团级）。

由于学校经费由省拨支，因此，学校会计主任须由省会计主管部门派任。

校长的任命条件，必须依照《修正师范学校规程》第110条的规定，即必须品格健全，才学优良，毕业于大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系或其它院系而曾习教育学科20学分，或高级师范

学校，且合下列资格之一的：

- 一、曾任国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或专任讲师一年以上的；
- 二、曾任省及直辖市教育行政机关高级职务二年以上，卓有成绩的。

但，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任用为师范学校校长：

- 一、违犯刑律证据确凿的；
- 二、曾任公务员交待未清的；
- 三、曾任校长或行政职务，成绩平庸的；
- 四、患精神病或身有痼疾不能任事的；
- 五、行为不检或有不良嗜好的。

对教师的聘任，也须根据《规程》要求，必须品格健全，其所任学科，须是本人所习学科，并对初等教育具有研究，合符下列规定之一的：

- 一、经师范学校教员考试或检验合格的；
- 二、国内外师范大学或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毕业的；
- 三、国内外大学本科、高等师范本科或专修班毕业后，有一年以上教学经验的；
- 四、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有二年以上教学经验的；
- 五、有价值的专门著作发表的；
- 六、具有精练技能的（适用于劳作科）。

威师建校初期所聘任教员，大多是由沦陷区流亡来川，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当时14名教师，3名兼课教师），各具专长，更具有爱国、敬业精神的中、青年。教育厅对教师聘任条件执行也较严格，如教师霍熙亮任童子军训练教官，因其非国民党员，教育厅便未予批准，其他教师根据《规程》检验合格者仅6人。

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的内战，以致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学校经费陷于极端困难，如以规定的教师月薪

聘任教员，根本不可能维持其最低生活，加之因山区艰苦以致有的教员又不愿来，所以学校只有少聘教员，以缺额工资贴补教师，而教育厅也放松了对教师检验的规定。

## 六、生源及报考条件

威师建成招生时，学校设三年制师范部（中师）和四年制简师部（初师），后于1943年将简师亦改为三年制。

学生来源，主要是招收“十六区”内藏、羌、回、汉等民族子弟。但，由于当时“十六区”文化落后，全区尚无一所初级中学，各县设有小学高年级的完小，为数也不多，学生来源十分困难。因此，便在优先录取本区考生的原则下，不足额数向内地灌县、郫县、彭县、温江、崇庆等县招收“竞考生”。

考生资格规定：中师生必须是初中或简易师范毕业，（简师毕业后已服务小学教育三年期满），年龄在18足岁至22岁的男女青年；同等学力（或具从事小学教育三年以上经验者），年龄在18足岁以上，而其录取限额，以只能占应录取数的5%为限。

简师招收小学毕业，年龄在15足岁以上，22足岁以下，或具有小学毕业同等学历的适龄男、女青年。

报考手续：报考中师生的初中毕业生，缴教育厅制《毕业证书》，如系简易师范毕业者，还须缴验服务期满证明。报考简师生须缴小学《毕业证书》。无论中师、简师于报考时都须缴最近脱帽半身像二张（照片背面必须填明本人姓名、年龄、籍贯、颁发《毕业证书》学校）。

考试科目：师范部中师生，无论是“竞考”或“十六区”内的考生，都必须考试国文、数学（包括算术、几何、三角、代数）、物理、化学、公民、历史、地理；简师则只考国文、算术、史地、公民。

“十六区”内考送生，由各县进行初考，试题较区外“竞

考生”简易，但到校后还须复考国文和数学。区外“竞考生”由学校派员前往内地招收或考生来校参考。科目考试及格后，还必须进行体格检查和口试（内容包括礼貌、仪表、态度、语言、整洁等），然后方决定是否录取。

尽管招生对象是以“十六区”内考生为主，但由于当时本区内考生不能达到应招人数的要求，建校初期生源还是区外“竞考生”较多，尤其是中师班。1940年所招的中师一班，应招数为50名，而实招仅33名，其中区内仅有汶川县3名，其余均为区外“竞考生”；简师一班甲、乙组共招生91名，其中外区生虽仅10名，但录取的81名区内生中，经报省教育厅缴验的小学毕业证明，就有58名批核为不合格。

随着各县小学逐年增多，茂县初级中学的设立，1944年以后，区内生源渐有增加。但无论区内、区外学生，毕业后都必须服务于“十六区”内的小学教育工作。

当时报考威师的学生，无论是区内或区外，绝大多数是来自贫困家庭，虽亦有极少数家境较好的学生，都是因为家庭不放心孩子远离去内地读书，因此报考了威师，后来不少人中途又转学内地，因为，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是教小学，没有社会地位，生活待遇艰苦，一般都认为教书是文人的末路，所谓“家有糊口粮，不当孩子王”；再者学校生活艰苦，每天两餐麦拉子（玉米面糊），中午一餐玉米蒸蒸，萝卜、白菜等低档菜为常吃的蔬菜，半月吃一次肉（打牙祭），每周吃一次豆腐（学生戏称豆腐牙祭）。简师一班学生郭荣，曾作“顺口溜”，以作对当时生活的写照：“麦拉子，面蒸蒸，萝卜、白菜土人参，稀哩哗啦吞下肚，管它卫生不卫生。”

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建国前的十年中，仍还是有中师6个班，简师12个班（实际是11个班，简师四班因辍学学生太多，将剩余学生转五班），共349人完成了学业，并在解放前

后为我州教育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主要原因是，无论“十六区”内或区外的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于贫寒家庭，有的本身就生长在高山村寨，因而有艰苦奋发向上的毅力，他们深知就是这样艰苦的读书条件，也是来之不易。

## 七、学生的培养

无论哪个统治阶级，欲巩固其政权，都无不深知培育人才的重要性。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开办威师的目的，亦正是为了开发边疆，作为抗日的大后方，以巩固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因此，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是根据“训育准则”，冀求把学生培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的师资”；必须使学生信守“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党员守则》（1、忠勇为爱国之本；2、孝顺为齐家之本；3、仁爱为接物之本；4、信义为立身之本；5、和平为处世之本；6、勤俭为持家之本；7、节约为治事之本；8、整洁为强身之本；9、服从为负责之本；10、学问为济世之本；11、助人为快乐之本；12、有恒为成功之本。），国民政府并以“四维”作为全国所有学校的共同校训。当时，在威师大礼堂的四壁，都用油漆书写了以上内容。

但，时代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可贵，是在于为真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万死不悔！尽管学校礼堂按当局的要求，书写了作为对学生培养“训育准则”的“金科玉律”，可是，学校的导师们，为能培养出当时边区小学教育所需人才，毅然选择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以他提出的“手、脑、心并用”、“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开发边区培养出能适应任何艰苦环境的师资。开办初期，学校趁尚无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的夹缝中，从校门到

学校各处墙壁都书写着贯彻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巨幅标语。

威师开办后，就给封闭落后，“不知天下事”的威州地区及相邻各县带来了一股关心国家民族兴亡的气息。当时所教唱的抗日歌曲是《大刀进行曲》、《追兵来了》、《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送郎参军》、《热血》、《黄河谣》、《日本鬼子狼子心》、《黄河在咆哮》、《黄河大合唱》、《打回老家去》、《岷江谣》、《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这些歌不仅响彻了校园，并通过学生下乡及街头所开展的抗日宣传，使不少老百姓也能传唱。这是源于当时学校老师，大多来自沦陷区，具有爱国热忱，他们中有的思想趋向进步，有的本身就负有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的使命。教师高庄、刘诈邦、霍熙亮等，以教唱抗战歌曲，讲授含进步思想的课文，讲述沦陷区日寇蹂躏中国人民的事实，组织学生到街头、乡村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对学生进行树立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故当抗战危急时，学生郭德同、袁希贤、高玉清投笔从戎，报名参军。学校常组织学生垦荒种菜，背煤、背石灰，修球场，对学生进行能吃苦耐劳、热心公益的品质的培养。因为有了这些培养，故在后来物价猛涨，学生生活困难时，能够组织学生上山砍柴自给。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崩溃，使得学校每况愈下，但是，对学生进行艰苦、勤奋的教育仍是主流。岁月如流，转瞬威师即将迎来她60华诞。自她诞生后，在她抚育下，当时风华正茂的40年代的学子们，曾饱经风霜，而今尚存者，大多已年逾古稀。然而，每当相聚回首寒窗共读时，对学校的培养和良师的教诲，仍常露满意与自豪的笑容，并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心得和体会。这难道不就是历史的印证和对母校培养的眷念情怀吗？

## 八、三民主义青年团

威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民国33（1944）年。其成立经过是这样的：民国32（1943）年冬，原三青团四川省支团书记倪光明，调任为十六区专员公署秘书，在他赴任路经威州时，住威师校，当询及校长雷金波，知悉威师尚无“三青团”组织时，便向雷说：“为了服务三民主义，统一学生思想，不让学生误入歧途，拟决定在威师建立三青团组织。”当即在全校一百多名学生中，办理入团申请手续。倪将申请材料携往茂县后，交由三青团茂县分团干事长刘芳桂办理。

民国33（1944）年春，刘携倪光明令办的申请材料，来威师主持入团宣誓仪式，并建立了团的组织。

威师三青团直属茂县分团领导，时设男生一个区队、女生一个区队。各区队设正副区队长各一人；区队下设分队，设正副分队长各一人；区、分队下都各设组训、宣传、总务干事1—2人，负责办理团务有关事宜。

民国34（1945）年，刘芳桂又来威师，发展中师四班、简师六班学生加入“三青团”，并增设一个区队。同时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威师区队联席会议办公室。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要民主，反独裁，党、团退出学校”的呼声下，民国35（1946）年，威师区队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潘继庆接茂县支团撤销威师三青团组织的通知，经请示校长唐开虞，令其将三青团联席会议办公室印章及所有材料，交学校训育主任何伟封存。至此，威师三青团组织便宣告结束。

#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威师校

(1950---1976年)

## 一、人民政府接管威师

民国38(1949)年下期，原威师校长欧阳志云即未来校，滞留成都以观时局，校务由教导主任刘世椿代行。由于解放军已逼近四川，时局急剧变化，学校提前放假。

是年12月中旬，“理县反共救国军”成立随即开赴威州，作试图抵抗解放军进军之势。威师便成了地方壮丁武装驻营地。学校只有一个工人李宗浩看守。因此，门窗户壁，课桌木床多被所驻壮丁武装人员用作柴火破坏殆尽。

1950年元月1日，原“理县反共救国军”易帜为“川康甘青各民族自救联军”，宣布“和平解放”。

同年2月，川西行署教育处，派王邦穆同志来校接管。从此，威师便成为人民自己的学校，在艰难曲折中，肩负起为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合格小学师资的光荣使命。

接管后，学校仍沿用原名。同年11月，川西行署文教厅以“教秘字第7046号令”将学校更名为“川西威州师范学校”；1953年，随着撤销原划分川西、川东、川南、川北行署的建制，学校亦随之更名为“四川省威州师范学校”，属省管理。1955年阿坝藏族自治州建立后，学校属自治州管理。

## 二、从简陋破烂中起步

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威师时，原学校留下的是满目荒凉的破烂校舍，和部份破烂待修的课桌、木床，其它设备几乎一无所

有。根据“修葺维持，逐步改造”的原则，全校师生以“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积极参与校舍改造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至1955年，学校占地面积已超过原占地面积，达9230平方米，绿化面积达5306平方米。1958年，学校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东风，发动全校师生动手，在姜维城的荒山坡上，开荒垦地建农场，共垦荒地26322平方米，栽植苹果树1000多株，为建立永久性劳动基地奠定了基础。1973年，为解决学生宿舍严重不足的问题，州文教局先后拨款6.5万元，本着节约的原则，师生大量参与修建中的辅助劳动，建成了140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每平方米造价仅46元)。1966至1976年期间，仅阿师专在威师校内时曾修建教室9间，另无什么改观。

至于教学设备方面，1952年春，仍只有教室8间，其中可使用的仅有6间，寝室亦只可容纳300人左右。一段时间，学生还需铺地铺睡觉。另外只有课桌椅170套，黑板9张。

令人高兴的是，解放后在中央、省、州党、政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今天的威师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凡曾目睹和了解威师过去景况的人，今天重来威师，一定会惊呼：“昔日破烂今何在？换了人间！”

### 三、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贯彻落实

人民政府接管威师后，由川西行署派来的教师，都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份子，学生也是原威师转入的，学校处于新旧教育思想交替转轨时期。如何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便是当务之急。

在大力宣传废除旧中国的教育制度的同时，学校组织师生学习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以改变其旧的观念，培养为人民服务精神；学习《共同纲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制订。当时具有《宪

法》作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以提高师生员工的政治认识和对人民政府政策法规的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及人生观》、《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提高师生员工的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提纲》,使师生明白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以清除轻视劳动,轻视工农大众的思想。同时使师生认识到,劳动教育与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许多因素是密切联系的,是德育的基本内容,是阶级教育的一部份,是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必由之路。同时,学校联系实际,发动师生培修校舍、修筑球场、搬运河沙、砍运木材、开垦校内荒地种植菜蔬等,以进行劳动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7年,毛主席在谈到有关教育问题时,根据当时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作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要指示。根据此指示精神,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教育方针”的精神,学校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要求教师认清教育的中心问题,是把教育与政治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大力克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教书不教人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学生中则开展以勤工俭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育学生做到“四要”、“四不要”,即要有共产主义雄心大志,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的精神;要有“一大”(大公无私)、“三热爱”(爱劳动、爱集体、爱公共财物)和为人师表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要有巩固的专业思想,一专多能的业务能力;要有能胜任复杂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健康体魄。不要自私自利,损公利己;不要好逸恶

劳，贪图便利；不要缺席旷课，不遵守纪律校规；不要忽视锻炼，不讲卫生。

通过对“指示”、“方针”的贯彻，学校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学校从总体布署到具体措施都紧扣德、智、体全面地、平衡地、和谐地发展，使教师在教学上出现了认真钻研业务，认真教学；学生在学习上出现了刻苦学习，自觉参加集体劳动和热心公益的良好校风。学校勤工俭学蓬勃开展，全校师生在姜维城开垦荒地53亩以种植果树和菜蔬。教学质量亦大有提高。因而1959年学校被评为阿坝州先进集体；1960年被评为省先进集体，副校长易汝奇还出席了“四川省文教系统群英会”；同年6月，党支部书记徐毅又代表学校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群英会”，学校被评为先进单位。

但是，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受到当时“大跃进”左的思潮影响，造成学校根本不可能再按教育规律办学。由于重生产劳动轻知识技能学习违背了师范教育的目的，以致教学质量曾急剧下降。

根据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来的失误进行了纠正。学校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措施，巩固成果，从教训中改进办学工作。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要求向雷锋学习为人民服务精神、敬业爱岗精神、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等。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全校师生中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出现了教师无论在课堂内外都不怕疲劳认真教育学生，学生勤学、勤问刻苦学习的好风气，热心公益，争做好事的事例层出不穷。